

屬國與保護之間： 以1880年代初期的清法越南交涉為中心

岡本隆司*

1885年6月簽訂的《天津條約》結束了中法戰爭。結果，清朝「喪失」了「屬國」越南，法國對越南的殖民地化政策獲得更大的進展。如何導致這樣的結果，亦即所謂「越南問題」的詳細經過，已經清楚地說明了。然而，終究大動干戈的清法兩國，究竟因何而針鋒相對？怎樣達成協議？雙方的具體的利害關係和外交談判，其實尚未辨明清楚。本文為了得到解決這些問題的線索，將以1882年年底，清法雙方同意的《李寶節略》為中心，研究兩國的談判過程。

1880年11月，因出使法國大臣曾紀澤向法國外交部提出抗議，使得清法兩國為「越南問題」而產生的對立變得明顯。1882年，在法國駐北京公使寶海與總理衙門交涉的過程中，出現了在北圻地區畫分勢力範圍的提案，同年年底，寶海與北洋大臣李鴻

* 京都府立大學文學部歷史學科准教授。
連絡地址：606-8522 日本國京都市左京区下鴨半木町1-5 (1-5 Hangi-cho, Shimogamo, Sakyo-ku, Kyoto 606-8522 Japan)

章在天津談判，擬定了《李寶節略》，將這個提案明文化。只是，《李寶節略》的漢文和法文版本有出入。在漢文版本中，記載「巡查保護」的部分，對應的法文版本只有「surveillance(監視)」之意，並不含有「保護」的意思。這樣的差異，恰好說明清法雙方的利害關係和潛在的矛盾。

清朝方面通過寫明「保護」，主張越南就是清朝的「屬邦」。相對於此，法方則不提「保護」二字，否認清朝對越南的宗主權，並想要使清朝承認法國對越南有事實上的「保護權」。就這樣，因為雙方的基本利益始終相反，《李寶節略》遭到否認只是遲早的事、不可避免的結果。即使是脫利古特使代替寶海，與李鴻章交涉，也無法輕易地消解雙方的緊張關係。清法兩國不久就走向戰爭之路。

關鍵詞：屬國、保護、越南、宗主權、《李寶節略》

一、前言

1885年6月簽訂的《天津條約》結束了中法戰爭。結果，清朝「喪失」了「屬國」越南，法國對越南的殖民地化政策獲得更大的進展。如何導致這樣的結果，亦即所謂「越南問題」，已經有許多的研究仔細地闡明其過程，¹因此，主要的事實經過，看來完全沒有問題。

縮寫：

AE: Franc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Chine.

DDF: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1871-1914)*, 1^{re} Série(1871-1900), Tome 4(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32).

Livre Jaune: Franc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¹ 首先，應該參考的是 Henri Cord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 Tome 2 (Paris: Félix Alcan, 1902), 242-551, 以及邵循正, 《中法越南關係始末》(北平: 國立清華大學, 1935)。二者到目前為止，仍舊是出色的研究。如果將詳述法方事情的前者當作「露骨地支持法國的立場」的話(坂野正高, 《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ヴェスコ・ダ・ガマから五四運動まで》(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73), 頁592 (陳鵬仁、劉崇稜譯, 《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2005), 頁496)), 從中國外交史這一觀點來重新建構史實の後者, 就是「露骨地支持」中國的立場。之後刊行了幾篇研究, 例如李恩涵, 《曾紀澤的外交》(臺北: 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1966), 頁164-245, 詳述了曾紀澤在歐洲從事的外交活動; Lloyd E. Eastman, *Throne and Mandarins: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Sino-French Controversy, 1880-188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透過「越南問題」, 試著闡明晚清中國的權力結構。坂野正高, 《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 頁341-369 (陳鵬仁、劉崇稜譯, 頁281-304), 主要是依據上述的研究成果, 作出簡明扼要而不偏頗的概論。或許是坂野的論述過於卓越, 日本方面, 到目前尚未出現針對「越南問題」而發的專門論文。

在越南近代史的研究中, 也有幾篇著述涉及了當時清法交涉的問題, 例如和田博德, 〈阮朝中期の清朝との關係(一八四〇年——一八五〇年)—アヘン戦争から清仏戦争まで〉, 收入山本達郎編, 《ベトナム中国關係史—曲氏の抬頭から清仏戦争まで》(東京: 山川出版社, 1975), 頁579-585、頁641-642; 坪井善明, 《近代ヴェトナム政治社会史——阮朝嗣德帝統治下のヴェトナム 一八四七—一八八三》(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1)。但是, 其主要關注的重點在越南的立場, 詳細提

可是，從近年重新受到研究者注意的晚清的「屬國」關係這一論點來看，²有幾個問題特別吸引了人們的目光。例如，清法具體的外交談判究竟是怎麼回事？終究交戰的兩國，到底是因何故而互相對立？如何能達成協議？究竟能否說清朝「喪失」了「屬國」？首先，我們先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大略地追溯這前後十餘年間的事實經過。

法國已經在 1860 年代兼併柬埔寨，使之成為保護國，接著以武力合併了越南的南圻地區。1874 年，法國的侵略，因與越南阮朝政府締結《甲戌條約》而進入新的階段。條約的第二款聲明：「承認越南國王的主權，及其面對所有國家，均完全獨立(*la souveraineté du Roi de l'Annam et son entire independence vis-à-vis de toute puissance étrangère*)」；第三款規定：「爲了對法國的保護表示感謝之意(*En reconnaissance de cette protection*)，越南國王悉遵法國的政策來決定本國的對外方針(*conformer sa politique extérieure à celle de la France*)，並不會更進一步變更現有的外交關係。」³這成了越南真正走向殖民地化的契機。

到 1880 年以後，法軍開始頻頻在北圻地區活動，而在清朝這一方面，也愈發警戒法國的動向。當時的駐法公使曾紀澤，高舉清朝對越南的宗主權，開始向法國外交當局提出抗議。

一方面，曾紀澤在巴黎繼續進行抗議活動之時，另一方面，法國海軍

到中法關係的研究為數不多。日本以外的情狀也不例外。但是，為了探索越南的「獨立性」、「獨特的實質」，瞭解清朝的立場和理解，尤其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到今天為止，連這樣的工作仍尚未達成。又，對中法戰爭本身進行研究的中文著作很多，但總的來說，不論在史料或論點方面，都沒能超越上述的研究。與本文相關的細微論點，以下逐次加以注釋。

² 見岡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近代清韓関係と東アジアの命運》(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

³ Henri Cord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 Tome 2, 268.

上校李維業(Henri Laurent Rivière)率領五百人的法國軍隊占領河內，清朝也派出廣西、雲南的軍隊進攻北圻，與之對抗。因此，在北圻地區的軍事情勢高度緊張，演變成實際的武裝衝突的情況下，清法兩國實際上的談判舞臺從歐洲轉移到中國；是年 10 月起，法國駐北京公使寶海(Frédéric-Albert Bourée)開始與清朝政府當局談判。到了 11 月底，在天津，與北洋大臣李鴻章達成協議，擬定了在北圻畫分勢力範圍的節略(以下稱為《李寶節略》)。

看來，到此結束的兩國糾紛，不久後再度發生。1883 年 2 月，茹費理(Jules François Camille Ferry)內閣成立。新政權否認了《李寶節略》，更換公使寶海。約在同時，李維業占領了南定，但在 5 月 19 日，與黑旗軍交戰而亡。正當清法兩國軍隊未敢撤退，在北圻相持不下之時，駐北圻民政特派員何羅 (François-Jules Harmand)直接與越南政府簽定了《順化條約》。法國明確地採取了拒絕清朝介入的姿態。清朝面臨法國的這些舉動，被迫採取更強硬的態度，表現出不辭一戰的準備。於是，在 1883 年年底到翌年 3 月間，爆發了山西和北寧兩次會戰，清軍戰敗。眾所周知，因此次戰爭失利，北京發生了政變，自從 1860 年以來，主導外政的恭親王奕訢下臺了。

爲了打破僵局，避免戰爭，李鴻章與舊識的法國海軍中校福祿諾(François-Ernest Fourmier)進行談判，於 1884 年 5 月訂定了《中法簡明條約》。不過，隨後在實行這個條約的階段，屢屢產生差錯，結果，清法兩國乃進入全面戰爭的狀態。陸戰方面，清軍占優勢，海戰則由法軍獨領風騷；到了 1885 年，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的交涉奏效，雙方在 4 月初約定停戰，6 月簽署了終結戰爭的《天津條約》。

雖然清法之間「武力對立、衝突和外交交涉的交錯過程，在現象上極爲複雜」，⁴但從上述的概述可見，迄至簽署和談條約爲止，雙方至少有兩次機會得以收拾對立的局面。第一次是 1882 年底簽定的《李寶節略》，第

⁴ 坂野正高，《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頁350(陳鵬仁、劉崇稜譯，頁287)。

二次是 1885 年 5 月締結的《中法簡明條約》。

因此，除了 1885 年，和談條約的談判外，從前的研究也相當注意《李寶節略》和《中法簡明條約》。雖然如此，諸家認為兩者不過是在困難的清法交涉中，嘗試講和而失敗的例子而已，並非從兩者的談判、締約，以及破裂，具體地表述清法雙方的立場和利害關係。所以，有關如何閱讀史料、解釋史實，還有再思考的餘地。

本文一概不提已經辨明清楚的史實，先以《李寶節略》為中心的清法交涉進行研究。這應該進而成為對當時「越南問題」整體，以及重新思考、研究晚清外交史的線索。

二、北京談判

1880 年 11 月 10 日，曾紀澤從聖彼德堡將抗議書信遞交法國外交部。據當時歐美人士的理解，這便是因越南而起的清法糾紛的開端。⁵以後，直到 1882 年為止，曾紀澤屢屢抗議有關法國在北圻的行動。⁶對此，新任外交部長杜克列(Charles Théodore Eugène Duclerc)終止與曾紀澤的談判，通告越南問題的交涉由駐北京的寶海公使與總理衙門來執行。⁷這是因為，與曾紀澤

⁵ 抗議書信是 le Marquis Tseng à Barthélemy Saint-Hilaire, le 10 novembre, 1880, cité par Cord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 Tome 2, 243. 漢文版本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法越南交涉檔》(臺北：中央研究近代史研究所，1962)冊1，〈曾紀澤給法外交部照會〉，光緒六年十月初八日，頁147-148。很明顯的，是Cordier, Henri Cord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 Tome 2 認為此書信是開端。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中卷，頁272，也採取此見解。作為當時解釋之一例，參見“France and China,” *The Times*, October. 29, 1883, 3.

⁶ 邵循正，《中法越南關係始末》，頁59-67；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頁167-191。其實，曾紀澤為何在此時提出抗議，其因果關係或動機並不清楚。

⁷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Première partie, 1874- décembre 1882* (Paris:

的談判陷入了清朝對越南的宗主權和法越《甲戌條約》的矛盾這一「原則」問題，難以達成協議，也是因為杜克列認為，總理衙門比曾紀澤好溝通，兩者的態度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於是，向來在巴黎的兩國「外交重心」，轉移到了北京。⁸

但是，「由寶海方面的接觸而開始」的北京交涉，⁹實際上，與總理衙門之間，未見任何效果。寶海接到杜克列的指示，於10月17日寄信總理衙門，詢問有關清廷派兵北圻的問題。¹⁰因此，是時開始的談判，因總理衙門在10月24日提出「越南係中國屬國(un État dépendent de la Chine)」，又再陷入所謂的「原則」問題。¹¹直到11月11日，寶海離開北京為止，雖然還有幾次會談，但都沒有做出任何決定。

不過，經由寶海和總理衙門的談判，可以了解兩個論點。第一個是法國的姿態。10月24日，寶海回覆總理衙門寄來的書信，言明：「貴國若提越南之(事) (votre suzeraineté sur l'Annam)，本國亦應以保護越南之約(vous opposer notre protectorat)」，不可收拾，故而「不如置之勿論(ne pas aborder ce côté de la question)」，再籌一通融辦理之善法(un accord infiniment

Imprimerie nationale, 1883), Duclerc à Bourée, le 16 septembre, 1882, 297-298.《中法越南交涉檔》冊1，〈總署收出使大臣曾紀澤函〉，光緒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頁524。

⁸ 邵循正，《中法越南關係始末》，頁66-70。「原則」這一概念，原是“une discussion de principe”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Première partie*, Gambetta au Marquis Tseng, le 1 janvier, 1882, 195)的譯詞(邵循正，《中法越南關係始末》，頁63)。

⁹ 坂野正高，《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頁353(陳朋鵬、劉崇稜譯，頁289)。

¹⁰ AE, Tome 60, Bourée aux membres du Tsong-Li-Yamen, le 17 octobre, les membres du Tsong-Li-Yamen à Bourée, le 18 octobre, 1882, annexes 3, 4 à Bourée à Duclerc, le 21 octobre, 1882.

¹¹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décembre 1882-1883*(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83), le Prince Kong à M. Bourée, le 29[sic] octobre, 1882, annexe 1 à Bourée à Duclerc, le 3 novembre, 1882, 8.《中法越南交涉檔》冊1，〈法使寶海致總署照會，收入總署收署北洋大臣李鴻章文〉，光緒八年十月二十七日，頁546-547。

désirable)。」¹²寶海如是敘述的理由是，無論如何，引清廷提出對北圻情勢「維持現狀(*le maintien du statu quo*)」的意向和諾言。¹³由此可見，法方的姿態，或至少是權主交涉的寶海關注的重點和處理方針，在於「維持」越南的「現狀」，如何決定後續的具體內容則是個問題。他盡量嘗試避免清朝的「宗主權(*suzeraineté*)」，或者法國的「保護權(*protectorat*)」這些「原則」問題，因為若提，則兩者在理論上並不相容，非但無法制約清法雙方的行動，也可能影響到實際的形勢。

即使是這樣，當時清法雙方不能達成協議的理由，也未必是清廷方面仍舊拘泥於「原則」，不能「籌一通融辦理之善法」。故於這次談判中，值得注意的第二點是，總理衙門未必完全不理睬寶海的提議。

根據寶海 11 月 4 日發出的報告，總理衙門大臣王文韶向翻譯官法蘭亭(*Joseph Hyppolyte Frandin*)「極保密地(*très confidentiellement, mystérieusement même*)」提出了「會容易地與法國達成和談」的方案。這個方案就是：「畫分北圻地區的保護權(*le protectorat du Tonkin*)」，「清朝占領紅河以北的全部地區，以南則法國擁有。」¹⁴與此同時，寶海收到來自法國駐河內領事可加拉德克(*Alexandre Camille-Jules-Marie Le Jumeau, comte de Kergaradec*)的私人信函。據信函所言，建議法國應當在中國的國境地帶畫定「一種緩衝地帶(*une espèce de matelas extérieur*)」，以避免與清朝的衝突。因此，寶海不得不關心王文韶的方案。¹⁵清法雙方摸索「和解」的過程中，寶海在與總理衙門談判

¹² 《中法越南交涉檔》冊1，〈法使寶海致總署照會〉，收入〈總署收署北洋大臣李鴻章文〉，光緒八年十月二十七日，頁546-547；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M. Bourée au Prince Kong, le 2 décembre [sic], 1882, annexe 5 à Bourée à Duclerc, le 20 décembre, 1882, 9-10, 46.

¹³ AE, Tome 60, Bourée à Duclerc, le 21 octobre, 1882.

¹⁴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Première partie*, Bourée à Duclerc, le 4 novembre, 1882, 325-326.

¹⁵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Première partie*, Bourée à Duclerc, le 4 novembre,

時提出這樣的具體方案，理當是相應的進展。

可是，談判暫停，「保護權」、「畫分」案，在北京沒有任何進展。至少，法方此後的談判記錄中，沒有提及這種事件。

有關這個問題，清方也留下了令人感興趣的記述。第二年年初，總理衙門在上呈的奏摺中概述了與寶海談判的經過：

嗣因該使臣將出京赴津，臣等與之來往會晤，談及法越一事，該使臣先咎其西貢總督辦理不善，商及「兩國派員設法商辦」，又言「越南毗連中國各省，歸中國保護」。臣等察其所言，似該國有欲轉圜之機，或可藉圖結局，以省兵力。¹⁶

「本年九月初六日」，亦即從 1882 年 10 月 17 日第一次的談判說起，次而記敘所引用的文章，主旨就是由寶海提議，清法派員商議，將和中國相連的越南地域置於清朝的「保護」之下。但是，根據寶海寄給杜克列的報告，派員商議實由王文韶建議，至於鄰接中國的地帶，亦由王文韶先提出，研究「為使其安全不受侵害而應採取」的策略；¹⁷清法的記錄互有歧異，不但

1882, 326. 寶海的報告中沒有記載這「私人信函」的寄信人。根據 Marie Joseph Claude Edouard Robert, comte de Semallé, *Quatre ans à Pékin, août 1880- août 1884. Le Tonkin* (Paris: Gabriel Enault, 1933), 95 推測可能為可加拉德克。但是，謝滿祿(de Semallé)記述，「私人信函」的日期是「11月8、9日」，並且，寶海向法國外交部通知他自己「堅決反對(absolument hostile)」，這些記述並不正確。從而龍章，《越南與中法戰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頁98-99。依據謝滿祿和漢語史料所言「寶海建議中法在北圻分區保護」是令人無法相信的。可加拉德克的簡歷，參見 Henri Cord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 Tome 2, 285。他在越南的活動，參見坪井善明，《近代ヴェトナム政治社会史》，頁77-80。

¹⁶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編，《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1932-1933)，卷3，〈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法越交涉一事法人現欲與中國會商亟應先事豫籌善法摺〉，光緒八年十二月初十日，頁24。

¹⁷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Bourée à Duclerc, le 21 novembre, 1882, 17-18.

提議者相互顛倒，「歸中國保護」與「爲使其安全不受侵害」的表述也大相逕庭。總理衙門也在發給曾紀澤的電報中通知同一交涉事實：

越事，寶言「法廷答西貢總督，辦理冒昧，非法本意。法只要如約而止。貢督託寶使調停，寶意欲中國先撤兵。再各派欽差，商辦此事」。答以「兵不便遽撤。若各派欽差，自可商辦」。寶問應商大畧。答以「約有三端。邊界、商務、及越須有以自立」。寶詢邊界說。告以「華豈有削越之意。因越北各省，多與雲粵毗連，必要保護」。寶云「若以後越北各省歸華護，南歸法護，何如」。答以「亦在應商之列」。寶云「派員一說，當即達知外部」。寶現到津，見李相。特電聞，以備外部問答。冬。

這是在 1882 年 11 月 12 日發出的電報，更加清楚的說明「畫分」「保護權」乃是寶海所提的方案。¹⁸

這種歧異產生的原因如何，真相不明。總之，已弄清楚的是，雖然在北京的談判已經提出這些具體方案，雙方並非沒有妥協的機會，但是，終究沒有作出任何決策，11 月中旬以後，談判的舞臺轉移到了天津。

三、天津談判

因此，寶海和北洋大臣李鴻章在天津的談判，可以說大體上是延續了北京談判的路線。法方權主交涉的當事人沒有改變；總理衙門在註 16 的引用的奏摺後繼續記述：「遂將各情函致署北洋大臣李鴻章，俟該使臣寶海到津，相機因應。」李鴻章也回覆道：「前奉九月二十九日、十月初二日公函，抄示與法國寶使會商越南事宜問答節略，謹聆壹是。」¹⁹從日期來看，所謂

¹⁸ 曾紀澤著，姜亞沙責任編輯，《曾惠敏公電稿》（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5），〈總署來電〉，光緒八年十月初四日到，頁103-104。

¹⁹ 《中法越南交涉檔》冊1，〈總署收署北洋大臣李鴻章函〉，光緒八年十月十九日，

「問答節略」的內容，可以說與註 18 所引、寄給曾紀澤的電報相同。由此可見，李鴻章面對談判的姿態，也以上述北京談判的論點為前提。²⁰將天津的李、寶談判置於那樣的位置，使得當時清法雙方的利害關係更明顯地表現出來。

這次交涉，僅僅兩天就有了結果。11 月 27 日，李、寶在天津的法國領事館進行會談，基本上形成一致的意見，翌日，基於此意見，寶海將寫好的草稿與馬建忠協商，擬成條文，即《李寶節略》三款。

《李寶節略》的內容如下：「(一)雙方撤退若干里；(二)二分國境與紅河之間的中間地帶，北方由中國，南方由法國，分別『巡查保護』；(三)維持北圻的現狀，亦即這是欲設置一種緩衝地帶的構想。」²¹像這樣，似乎是從北京談判的經驗中制定出來的內容，但就那樣實施，好像也沒能完全解決雙方爭執的焦點。

試看最重要的第三款，漢文版本如下：

今為驅逐沿境滋事匪徒，令地面得以治理平靜，中法兩國國家，在雲南、廣西界外與紅江中間之地，應劃定界限，界北歸中國巡查保護、界南歸法國巡查保護。中法互約申明永保此局，並互相立約，將越南之北圻現有全境，永遠保全，以拒日後外來侵犯之事。²²

頁 531。又見薛福成撰，《庸盦文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 3，〈代李伯相復曾宮保書〉，辛巳，頁 190-191。

²⁰ 李鴻章事後談心寫道：「弟本不欲與聞茲事，無如譯署委令寶使赴津纏擾，事關中外大局，復何所諉。」(見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20，〈復倪豹岑中丞〉，光緒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頁 37)，也可見當時的事情。

²¹ 坂野正高，《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頁 353 (陳鵬仁、劉崇稜譯，頁 289)。從「維持」「現狀」的記述來看，可以說這些引用文所依據的是法文版本(見註 23)。但「巡查保護」是漢文版本的詞句(見註 22)。坂野氏對這個部分引用了漢文原文，很可能是因為他已經察覺到下面提到的漢法兩版本的出入。

²² 《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 3，〈李鴻章與法使寶海所議越南事宜三條〉，收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法越交涉一事法人現欲與中國會商亟應先事豫籌善法摺〉，光

與此相應的法文版本如下：

Afin de purger le Tonkin des bandes de malfaiteurs qui le désolent et le rançonnent, et de procurer au pays une administrations régulière, offrant pour tous des garanties d'ordre et de sécurité, les deux Gouvernements s'accorderaient pour tracer une ligne de démarcation qui devrait être établie d'un commun accord dans la contrée comprise entre fleuve Rouge et les frontières de la Chine; les territoires situés au nord de cette ligne seraient placés sous la surveillance de la Chine, tandis que la région qui s'étendrait vers le midi se trouverait sous celle des autorités françaises. La Chine et la France s'engageraient réciproquement à maintenir le *statu quo* ainsi convenu et à protéger éventuellement l'intégrité du Tonkin dans ses limites actuelles contre toute entreprise du dehors qui serait de nature à y porter atteinte.²³

(為驅逐北圻騷擾、勒索的匪徒，使該地區的行政正常化，維護本地的治安，兩國政府同意在紅河和清朝邊境之間的地區協商畫定分界線；界線以北歸清朝監視，界線以南歸法國當局監視。清法兩國互相保證，維持這種商定的現狀，並且保全北圻現有邊界內領土的完整，不致使遭受任何外來侵犯的損害。)

漢法兩版本的大意，看起來似乎沒什麼出入。但是，應該注意的，還是前者的「巡查保護」這一字句。與此對應的法文原文是「la surveillance(監視)」；嚴格來說，漢語原文僅僅表達了相當於「巡查」的意思。

這個出入決非偶然。兩者所指，都是「驅逐(purger)」「匪徒(des bandes de

緒八年十二月初十日，頁25。

²³ DDF, Bases de l'arrangement proposé par M. Bourée, Ministre de France à Pékin, Shanghai, 20 décembre, 1882, 560-561.

malfaiteurs)」以「維護治安」的同一內容，以及「永保此局(maintenir le *statu quo*)」，而「保全越南之北圻現有之全境(*protéger éventuellement l'intégrité du Tonkin*)」的同一目的，然而，寶海在法文版本中，卻加以迴避相當於「保護」這樣的用語。因為，11月27日的李、寶會談紀錄中，「保護」這個詞彙的相關爭論頻頻被記錄下來，而且，法語也有別種語言的翻譯對應。

例如，漢文版本如下：

答云：「……今法國議辦越南事宜，當以上安中國綏撫藩服之心，外息羣喙鼓簧之論，為第一要義。兩國若派大臣會議，似宜於條約上載明『法國認越南為中國藩屬，中法兩國共同保護，以敦睦誼』等語，則造作謠言者，既無所藉口，而中國綏撫藩服之心，亦可稍安。……。」

寶云：「……但『共同保護』四字，恐分別不甚清楚。越南為中國屬邦，則中國固有保護越南之權，如不預分界限，日後必有相諉責成，相爭權利之處。且法國保護越南之權，得之中國乎，抑自有之乎。中華為越南上國，今令法國保護越南，是以保護之權授法國也。如法國自有其權，是中國既已保護越南矣，而法國復保護之，其事不甚便。」²⁴

與此文對應的法文版本如下：

Le Vice-Roi. «Ne pourrions-nous déclarer, d'une part, que la Chine reconnaît votre suzeraineté dans l'Annam, là où vous l'exercez déjà, c'est-à-dire à Saïgon et dans les six provinces; d'autre part, que vous reconnaissez la suzeraineté de la Chine dans le reste de l'Annam, sauf à y exercer le Protectorat conjointement avec nous? Cette déclaration

²⁴ 《中法越南交涉檔》冊1，〈總署收署北洋大臣李鴻章函〉，光緒八年十月十九日；〈與法國寶海面談節略〉，光緒八年十月十六日，頁533-535。

recevrait la plus grande publicité possible, et notre amour-propre serait sauf, sans que vos intérêts soient lésés.》(總督：「我們能否聲明如下：一方面，清朝承認法國對越南之內已經實行統治的地方，即對西貢，以及六省的統治權，另一方面，法國則承認清朝對越南其他地區享有宗主權，但法國在那裡可與清朝共同行使保護權。這一聲明，將盡可能接納多方的做法，不僅不損法國的利益，也能照顧到中國的自尊心。」)

Le Ministre. 《Il ne s'agit point ici de l'Annam, mais seulement du Tonkin. On ne peut accoupler ces mots de suzeraineté et de protectorat, sans entrer dans tout un travail de définitions. La communauté dans le protectorat y nécessiterait un partage. Je ne vois pas encore bien nettement ce que vous désireriez.》(公使：「我們此處根本不涉及越南問題，談的只是北圻，不能將「宗主權」和「保護權」這兩個詞牽扯在一起，除非是對它們作大量定義的工作。如果保護權含有共有的意義的話，那就必須畫分界限。我還不清楚你們希望的是什麼。」)²⁵

漢法兩版本的文章，不但在繁簡方面，連在結構方面，也有很大的歧異。但是，漢語中的「保護」一詞，必定以「protectorat」這個術語來對應，形成與「上國」、「suzeraineté(宗主權)」相對的概念。

這在理解和用法上是正確的。據李鴻章向總理衙門提出的說明來看的話，他認為談判「宜從『(越南是)中國藩封』入題」。²⁶那是因為，雖然寶海「明知係我屬國」，但卻「將中國屬邦置之勿論」的緣故。站在李鴻章的立

²⁵ AE, Tome 60, Procès-verbal d'un entretien entre M. Bourée, Ministre de France en Chine, et le Vice-Roi Li-Hong-Tchang, au Consulat de France à Tien-Tsin, le 27 novembre, 1882, annexe 1 à Bourée à Duclerc, le 20 décembre, 1882.

²⁶ 《中法越南交涉檔》冊1，〈與法國寶海面談節略〉，光緒八年十月十六日，頁533-534。

場來說，爲了達成協議，首先，不得不「開宗明義」的提出此前提，曉諭之後，使寶海「允中法互相保護，畫定界限」的方針。如此一來，「則越南爲中國之屬邦，不言而喻矣。」²⁷清朝自從北京談判以來，支持畫分北圻南北勢力範圍一案的目標，到此方才清楚。清朝必須保全本應屬於清朝的勢力範圍的保護權，因爲這種「保護」即是「越南爲中國之屬邦」的證明。

對此，寶海「一開始便撇開有關保護權或宗主權這樣的理論性問題(les questions théoriques de protectorat ou de suzeraineté)不談」，²⁸從「原則」問題無謂的爭論經過來看，乃理所當然。而且，他爲了在實際上確保「安全」與達成「和解」，未必反對北圻南北勢力範圍畫分的方案。²⁹但是，因爲李鴻章提出與勢力範圍畫分攸關的「宗主權」與「保護」不可分割這一概念，寶海也不是那麼輕易就能接受的。

故而雙方都希望能夠「維持」北圻的「現狀」，同時，清方也想以「保護」這一漢語的概念，主張對越南的「宗主權」；法方則以《甲戌條約》的存在爲前提，避免提及「保護權」、「宗主權」等用詞。雙方雖然同樣採取迴避衝突的方針，但在概念定義方面，則是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是以，爲了使雙方能夠妥協，除了明確規定雙方都能同意的行動外，對於矛盾的概念，也必須使用雙方都能接受的表現。《李寶節略》的法文版本不言「保護權(protectorat)」，而言「監視(surveillance)」；這大概就是馬建忠

²⁷ 《中法越南交涉檔》冊1，〈總署收署北洋大臣李鴻章函〉，光緒八年十月十九日，頁531。

²⁸ AE, Tome 60, Procès-verbal d'un entretien entre M. Bourée, Ministre de France en Chine, et le Vice-Roi Li-Hong-Tchang, au Consulat de France à Tien-Tsin, le 27 novembre, 1882, annexe 1 à Bourée à Duclerc, le 20 décembre, 1882.

²⁹ 例如寶海在被罷免公使後，送交外長的信函中(見註42)，將應該畫定的勢力範圍稱之爲「中立地區(la zone neutre)」，也衷心地說：在「11月4日」，這個「曾經看來可厭(paraissait détestable)」的方案，到了「5日」就「認為是最好的(sembler désirable)」了。又見註14、15。

「翻譯」的漢文版本中，將之稱為「巡查保護」的結果。「保護」這個詞，在漢文版本中必須強調，而法文版本中則應該避而不談。馬建忠擔任條文的擬定工作，向李鴻章報告說：「寶使起稿，相對辯論三時之久，稿經七八易而成」，³⁰未必是誇大其詞。

四、寶海的罷免

在天津獲得共識後，寶海再次把《李寶節略》的主旨通知總理衙門，獲得承認之後，³¹即向本國政府發送報告書。³²其中，最早送達巴黎的電報如下：

與直隸總督擬定，並得總理衙門同意的協定草案，下次郵遞呈給您。
其內容是開放雲南；除了中國國境沿邊之地帶外，清朝承認法國在北圻的保護(reconnaissance de la protection française au Tonkin)；雙方互保此局，共同對抗外來的侵犯。³³

³⁰ 《中法越南交涉檔》冊1，〈總署收署北洋大臣李鴻章函〉，光緒八年十月十九日，頁531。尤其是漢文版本中，「巡查保護」這一措詞，很可能是馬建忠自己下手的，因為他在快要開始天津談判之前，在朝鮮從事有關「屬國自主」問題的談判。參見岡本隆司，《屬國と自主のあいだ》，頁51-133，岡本隆司，《馬建忠の中国近代》（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頁79-174。

³¹ 寶海寄給總理衙門的書信，收錄於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M. Bourée à Leurs Excellences les Membres du Tsong-li-Yamen, Tien-Tsin, le 5 décembre, 1882, annexe à Bourée à Duclerc, le 27 décembre, 1882, 56-58. 其漢文版本，見《中法越南交涉檔》冊1，〈總署收法國公使寶海照會〉，光緒八年十月二十七日，頁549。站在法國本國的立場，未必可以說是總理衙門予以「承認」。參見 Un diplomate [Albert Billot], *L'Affaire du Tonkin: 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l'établissement de notre protectorat sur l'Annam et de notre conflit avec la Chine, 1882-1885*(Paris: J. Hetzel, [1885]), 29-30.

³²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Bourée à Duclerc, le 27 décembre, 1882 [reçu le 7 février], 51-56. 其漢文版本，見《中法越南交涉檔》冊1，頁544-545。

³³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Bourée à Duclerc, tél., le 29

字面上可說沒有虛偽、錯誤。但是，鑑於前節的觀察，整段文字的措辭也不能說完全正確。

引文中的「保護(protection)」一詞，雖然也是明記在《甲戌條約》中的詞句，但嚴格來說，是表示行動的行動的抽象名詞，與「保護權(protectorat)」的意思有別。這個意思，與《李寶節略》法文版本中的「監視(surveillance)」，或在北京談判時使用的「安全」、「不受侵害」等詞句所指內容相同。寶海透過將這種行動稱作「保護」，想要與法國在《甲戌條約》上沒有明確記載，但實際上卻獲得的「保護權」結合在一起。事實上，當時的著述把電報的字眼改為「承認法國在北圻的保護權(reconnaissance du protectorat français sur Tonkin)」，³⁴後來，無論是故意，還是不知不覺地，寶海自己也寫過同樣的記述。³⁵從當時法國的立場和見解來看，自然應該那樣解釋。但是，究竟是否能說清朝因擬定《李寶節略》而「承認法國對北圻的保護權」？這是《節略》本身蘊含著的問題。

杜克列外長接獲寶海的通知，決定承認《李寶節略》。然而，不久之後，在寶海正式且詳細的報告送達之前，杜克列外長即離任。1883年2月21日，第二次茹費理內閣成立。新政權立即否認《李寶節略》，寶海受命召回。就如邵循正曾說：「法政府之召回寶海，表面雖似為法律問題，實際上全為政治關係。」³⁶也就是說，法國因為政權交替之故而改變了外交政策。這是

décembre, 1882, 1.

³⁴ E.g. Un diplomate [Albert Billot], *L’Affaire du Tonkin: 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l’établissement de notre protectorat sur l’Annam et de notre conflit avec la Chine, 1882-1885*, 20.

³⁵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Bourée à Challemel-Lacour, le 17 mars, 1883, 102.

³⁶ 邵循正，《中法越南關係始末》，頁74。從此以後，尤其中文論著對法方的史料不加以研討而沿襲這種看法。另外，有關罷免寶海，除了北圻問題以外，Henri Cord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 Tome 2,

切合清方看法的見解，因為李鴻章當時提及：「詎該國適有內訌之事，執政易人，幡然變計，並將寶使撤回。」³⁷這並非全是誤解。但是，所謂「法律問題」，換句話說，亦即《李寶節略》本身蘊含的問題，也不是完全沒有關係。

3月5日，命令罷免寶海的電報記載：這份《節略》「做了不是我們可以答應的一些讓步。」³⁸法方原意在務必使清廷承認《甲戌條約》中所定法國對越南的「保護」，寶海的交涉當然也是以此為前提。但是，據《李寶節略》，清朝並未完全放棄對越的「宗主權」，因此，是否當作清廷「承認」了「法國的保護權」？法方意見分歧。杜克列外長肯定這樣的談判結果，反之，茹費理內閣則不「可以答應」。他們「認為與清方的談判，使寶海誤入歧途。」³⁹

先是署理海軍及殖民地部長馬意(François Césaire de Mahy)評論，《李寶節略》「看起來好像是承認中國的宗主權，或至少承認中國對越南和北圻的事件有一種干預的權利」；以《北華捷報》等報導為例，對外交部批評道：「法國在北圻的利益，恐怕沒由寶海公使獲得完全的保衛。」像這樣，從第三者的眼光來看，《李寶節略》似乎是「承認」與法國的「保護權」「勢不兩立」的清朝的「宗主權」的文書。⁴⁰不久，被任為外長的沙梅拉庫(Paul

364-366 指出有改訂上海法租界規則的問題。

³⁷ 《中法越南交涉檔》冊2，〈總署收署北洋大臣李鴻章函〉，光緒九年二月初一日，頁630。

³⁸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Challemeil-Lacour à Bourée, tél., le 5 mars, 1883, 70.

³⁹ Un diplomate [Albert Billot], *L'Affaire du Tonkin: 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l'établissement de notre protectorat sur l'Annam et de notre conflit avec la Chine, 1882-1885*, 35.

⁴⁰ DDF, de Mahy à Fallières, Confidentiel, 20 février, 1883, 590-591. "The Tonquin Affair," *North-China Herald*, 10 January 1883, 38-39.

Armand Challemel-Lacour) 於 1883 年 7 月在法國下議院進行答辯，宣讀《李寶節略》之後，斷言之「不過是要分割保護權的協定而已(tout simplement le partage du protectorat)。」⁴¹他採取寶海在擬定《節略》的條文時嘗試避免的解釋，大概可以說清朝的企圖也在於此。註 27 引用的李鴻章的言論，絕不是只有在清朝內部才行得通、自以為是的言辭。

對寶海而言，來自法國的這些「責備」，其實「正好相反」，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⁴²但是，清方在《李寶節略》中置入的目的，寶海自己也終於領會到了。

寶海一在上海接到解任的電報，一方面立即向法國本國加以說明自己在談判中採取的態度，另一方面，再度趕赴天津，和李鴻章展開會談。其時雙方會談的議論報告如下：

總督接著說：「那麼，法國是否堅決地拒絕承認清朝對越南的宗主權 (reconnaître notre droit de suzeraineté sur l'Annam)？可是，這個權力畢竟是眾所周知、無可爭議的。因為有個未曾中斷的傳統強力地支持著這個權力。……另外，因為《甲戌條約》是在清朝沒有參加的情況下簽訂的，所以，我們從來沒有遵守這個條約的義務。並且，你也很清楚，當法國向北京通報這個條約時，清朝明確持有保留的態度，聲明越南是當下法國不願考慮的屬國。」……⁴³

⁴¹ “Discussion des interpellation sur la politique du gouvernement au Tonkin et dans l'extrême Orient,”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ébats parlementaires, Chambre des députés* (Paris: Imprimerie des Journaux officiels, Session ordinaire de 1883, séance du mardi 10 juillet 1883), 1686.

⁴² Bourée à Challemel-Lacour, le 21 mars, 1883, cité par Henri Cord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 Tome 2, 368, Semallé, *Quatre ans à Pékin, août 1880- août 1884. Le Tonkin*, 105.

⁴³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Bourée à Challemel-Lacour, le 30 mars, 1883, 111.

總督繼續說：「……此時，嗣德王的戶部尚書就在此地，他繼許多人之後特地來到此地，為的是向清朝重述同一言辭，而且要求清朝給予支持，抵抗法國。這種支持對於屬國而言，是理所應有的(l'appui inhérent à la vassalité)。總之，他不是放棄屬國的義務，而是要求得到屬國應得的好處。」

總督在停頓了一會後繼續說：「法國是否不願意承認清朝的宗主權，以及這個宗主權賦予清朝介入北圻問題的權利？」……。

……我表示反對意見：「但是，在清法共同擬定的協定中，沒有提到清朝的宗主權。因此，法國認為這應該是清朝能夠接受的表達方式。……。」

「確實，那裡沒有記載我們的宗主權。但是，從法國方面來說，法方也不應該說任何意味著正式否認這個宗主權 (*en impliquât la méconnaissance formelle*) 的話。……。」

說過對此「表示驚訝」的寶海，⁴⁴隨後到達北京，再次聽到總理衙門主張同一內容的發言。

「越南是清朝的朝貢國(un pays tributaire de la Chine)，從未想過迴避作為屬國的義務([les] devoirs de sa vassalité)，而且清朝政府也有責任和權利參與該國的事務。」……。

我竭力反對清朝的宗主權([les] droits de suzeraineté de la Chine)。我認為，這種宗主權是脫離實際，毫無實效而感情用事的(plus platoniques que réels, plus sentiment aux qu'utiles)，……我提醒：「法

⁴⁴ AE, Tome 61, Bourée à Challemel-Lacour, le 30 mars, 1883. 法文版本的斜體字依據原文。「嗣德王的戶部尚書」當作「刑部尚書」，應該相當於「越南陪臣范慎邁」(比如《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14，〈論越事應固防觀變〉，光緒九年二月十七日，頁9)。他帶來的越方文件是《中法越南交涉檔》冊2，〈越南國王密函〉、〈越南國王呈文〉，(光緒九年)二月十五日到，頁699-703、704。

國在簽訂《甲戌條約》的時候，清朝並未加以反對，而從那時起，它的抗議也只呈現純理論的性質(un caractère purement théorique)。」正像「衙門……回到其過去的論據(revenant à son argumentation passée)」⁴⁵那樣，無疑又回到了「原則」問題。最後，寶海實際上不得不客觀地承認自己的失敗。他以為，當談判進行時，因為迴避「原則」的爭論而得到了成果，但在不知不覺得，爭論又回到「原則」問題上。

五、從寶海到脫利古

在寶海的繼任者到達中國之前，駐日公使脫利古(Arthur Tricou)暫任商議越南問題的全權特使，在6月初到中國赴任，與在上海等候的李鴻章立即展開談判。⁴⁶然而，李、脫的談判既然以上述的經過為前提，其爭論因陷入追究清越宗屬關係是非的「原則」問題而立刻停頓。脫利古除了重覆和被罷免後的寶海一樣的問題外，還不得不討論追認1875年《甲戌條約》的問題。

試從清方的史料來了解這一部分的談判。首先是6月8日的會談：

答以：「……但越久為中國屬邦，貴國斷難勉強中國不認。」

⁴⁵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Bourée à Challemeil-Lacour, le 17 avril, 1883, 135, 136. 與此對應的清方史料，是《曾惠敏公電稿》，〈總署來電〉，(光緒九年)三月十五日到，頁215-216，但是還沒有收錄全文。

另外，李鴻章和總理衙門的這種態度，有可能是受到馬建忠的建議。他說：「彼國如此翻覆，是曲在彼」，「難概從前議」，所以「吾似不可過示以弱」(《中法越南交涉檔》冊2，署北洋大臣李鴻章收馬建忠來電，光緒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晚九點鐘、光緒九年二月初六日夜十點鐘，頁631-632、689)。馬當時駐在上海，在寶海到天津去之前與他有交往，早已得到法國罷免他的消息。

⁴⁶ 眾所周知，這次與脫利古的談判，與寶海相反，是由李鴻章主動著手的。參見坂野正高，《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頁354(陳鵬仁、劉崇稜譯，頁290)。陳季同在法國作幕後活動，也是由李鴻章指示。參見桑兵，〈陳季同述略〉，《近代史研究》，第4期(北京，1999)，頁118-122；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21-27。

脫云：「法國自甲戌立約以後，已有明文，斷不肯定。至中國必欲自認越南上國，本國亦難相強。總之，今日務須詢明貴國之意，他日或明助或暗助越南以攻我否，本國切願明知此意，以定調兵數目。……。」⁴⁷

接著，6月17日的會談：

脫使來見，攜有彼國外部電報，令其於繙譯朗誦，曰「汝問中國如欲與法失和，我已豫備整齊，斷不因循退讓。如中國派兵，明助越南，或暗助，可先說明。如不助越，要取一確實憑據，電覆」等語。答以「中國並無願與法國失和之意。但越為中華屬國，已數千百年，法不能強我不認。此時法越既經交兵，想中國未必助越。然法不與華妥商辦法，無論所辦如何，華終不能認」。

脫云「法與越南甲戌之約，當即照會中國，現在必須照約辦理」。

答云「甲戌之約，當日總署照覆，駁以『越南是中國屬國』，明是不認此約」。

……

脫云「請速電告國家明示日後不管越事，給我一文書憑據」。

答云「此斷不能行之事」。

脫遂忿然作色拂衣而出。⁴⁸

⁴⁷ 《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14，〈答拜法使脫利古問答節略〉，光緒九年五月初四日附，頁11-12。當天，李鴻章將其要旨致電。《李文忠公全集·電稿》，卷1，〈寄譯署〉，五月初四日午刻，頁17。總理衙門回電，囑李說服脫利古：

初四密電悉。脫言「不認越為中屬」，此說自須力爭。……如此保護，原因越為屬國，我既盡保護責，即不能聽他人之取越。中國並非欲於法失和也。……。

⁴⁸ 《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14，〈接見法國脫使問答節略〉，光緒九年五月十三日附，頁14-15。當天，李鴻章將其要旨致電。《李文忠公全集·電稿》，卷1，〈寄譯署〉，五月十三日午刻，頁21。

所引用的法國「外部」電報，收入於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李鴻章與寶海的談判既然受挫，像當時那樣「撇開」「原則」問題置之不談的辦法，事到如今已經無法再用。如同引文所述，脫利古對清朝採取拖延「戰術」、毫無收穫的爭論感到心煩意亂，控訴「不徹底的權宜之計」的危險性，向本國政府建議實施斷然的處理辦法。⁴⁹

……在法國要求清朝承認條約所確定的保護國毫無結果時，清廷與嗣德帝(l'Empereur Tu Duc)秘密勾結，並命嗣德帝不得與共和國政府簽訂任何條約。如此一來，法國在越南也好，在中國也好，都受到損害，時日益久，而我國之處境則日益惡化。最後，請允許我再談一下我曾向您提過的建議。我認為，對順化朝廷發動一次攻擊，以海軍在中國沿海地區實施有力的海上鉗制，就足以抑制因我們軟弱等待而日益囂張的氣焰。如果我們要動武，就必須掌握時機。⁵⁰

不用說，這樣的懷疑，不久就導致與越南政府簽訂《順化條約》。法國政府的外交政府至此開始大大的轉變。

此後的兩個月間，脫利古與李鴻章進行談判。有人認為他的作法不過是「排除中國的干涉，減少法越間交涉的困難。」⁵¹即使如此，當時，法國當局實際上也不願外交談判破裂，⁵²那麼，試看談判進展之所需，也不是無益於考察當時的形勢。就此而論，6月30日的會談就值得注目。據李鴻章

Challemel-Lacour à Tricou, tél., le 13 juin, 1883, 138-139, 但是沒有提到「明助」「暗助」的一節。

⁴⁹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Tricou à Challemel-Lacour, tél., le 18 juin, 1883, 139-140.

⁵⁰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Tricou à Challemel-Lacour, le 22 juin, 1883, 179. 這篇文件的日期，在下面提到的中法互相嘗試達成協議的會談(見註53)之前，但是在其會談結束之後，脫利古也反覆同一主張。參見 Tricou à Challemel-Lacour, tél., Confidentielle, le 4 juillet, 1883, cité par Cordier, 397.

⁵¹ 邵循正，《中法越南關係始末》，頁84。

⁵² E.g.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Challemel-Lacour à Tricou, téls., le 13 juin et le 3 juillet, 1883, 138-139, 150-151.

的報告，脫利古為達成協議而倡議如下：

……所商辦法，總以保全兩國體面為主。中國不必明認越南為屬國，法國亦不必明認保護之權。若欲明認，必互執己見，總難說得合攏。不如勿提明為妙。惟兩國自保已有之權利耳。本大臣當即擬一節略，明日持呈。⁵³

其實，到底是那一方提出如上的主旨，並不清楚。總之，由此可見，像寶海曾經嘗試的那樣，雙方必須「撇開」而不書明「原則」，談判才能進行下去。⁵⁴翌日，7月1日，脫利古提出了「不使用宗主權和保護權字眼(*laissant de côté les mots de suzeraineté et de Protectorat*)」的「節略(*propositions*)」。⁵⁵對此，李鴻章回答：

節略所稱各節，與中國意見未合。越南素為中國屬邦，天下共知。今吾兩國，欲商一兩不相礙之法，故有「不必顯然提及屬邦保護字樣」之說。然究不可顯然棄却屬國名分。如節略內稱「中國約明不顯然或暗中干預越事」一語，豈非顯然棄却屬邦名分乎。⁵⁶

⁵³ 《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14，〈法國脫使來晤問答節略〉，光緒九年五月二十六日附，頁18-19。當天，李鴻章將其要旨致電。《李文忠公全集·電稿》，卷1，〈寄譯署〉，五月二十六日申刻，頁26。與此對應而報告6月30日的會談的法文史料是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Tricou à Challemel-Lacour, téls., le 1 et le 3 juillet, 1883, 149, 151.

⁵⁴ 因為脫利古明文記載他自己答道「撇開」清朝的「宗主權問題」(*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Tricou à Challemel-Lacour, le 1 septembre, 1883, 248)，所以當然有由他提出的可能性。但是，根據他的電報和報告，這是否跟寶海的談判一樣正式發言、方針值得懷疑。

⁵⁵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Tricou à Challemel-Lacour, tél., le 3 juillet, 1883, 151-152; Tricou à Challemel-Lacour, le 1 septembre, 1883, 250.

⁵⁶ 《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14，〈法國脫使來晤問答節略〉，光緒九年五月二十七日附，頁20。與此對應的法文史料是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Tricou à Challemel-Lacour, tél., le 3 juillet, 1883, 152; Tricou à Challemel-Lacour, le 1 septembre, 1883, 250-251。不用說，兩者之間很有出入，例如

如實地表現出李鴻章關心的重點。此事關乎「屬國名分」的存立，與是否白紙黑字寫明「不干預越事」很有關係，不明示「屬國」這一「原則」，而利用行動的規定想要表現自己的「屬國」關係，和寶海的談判是同一理論。

這樣看來，只要遵照自己的解釋，《李寶節略》的內容就是清方容易接受、同意的條件。至少總理衙門和李鴻章是這樣想的。⁵⁷因而，當時法國下議院正式否決了的《李寶節略》和北圻「保護權的畫分(le partage du Protectorat)」案，⁵⁸對清朝而言，依然有繼續存在的可能性。與李、脫的談判同時，曾紀澤繼續試著與巴黎談判，提出相同的方案，⁵⁹而李鴻章甚至在得知法越締結《順化條約》後，利用與脫利古交涉而提出同樣的案子。⁶⁰

這樣根本無法達成妥協。寶海雖然「撇開」了「原則」，方才能擬定《李

「屬國名分」一段、脫利古積極接受李鴻章的要求的姿態等，法方史料沒有記載。兩者都敘述的是，最後不達成協議的、是否明文記載清朝承認《甲戌條約》的問題。參見《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14，〈法國脫使來晤問答節略〉，光緒九年五月二十七日附，頁21；*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Tricou à Challemel-Lacour, tél., le 3 juillet, 1883, 152. 邵循正，《中法越南關係始末》，頁80-81。問題的根源仍然在於《甲戌條約》規定的越南的「獨立」和法國的「保護」，與清朝的「原則」相違背。

⁵⁷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復倪豹岑中丞〉，光緒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復張蕢齋署副憲〉，光緒九年五月二十日，頁36-37、43。張佩綸，《澗于集·書牘》，卷3，〈復唐鄂生中丞〉，頁9。

⁵⁸ *Journal officiel, Débats parlementaires, Chambre des députés*, 1693.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Challemel-Lacour à Tricou, tél., le 11 juillet, 1883, 167. Un diplomate, [Albert Billot], *L'Affaire du Tonkin: 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l'établissement de notre protectorat sur l'Annam et de notre conflit avec la Chine, 1882-1885*, 58.

⁵⁹ 暫且參見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頁207-213。有關曾紀澤對越南問題的談判以及他的主張，還有重新考察的餘地。當時，不管手法的差異，李鴻章和曾紀澤都到底以「分護」為目標。參見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頁205-206。

⁶⁰ 比如《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14，〈與法國德里固問答節略〉，光緒九年八月十八日附，頁36、48；*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Tricou à Challemel-Lacour, tél., le 26 septembre, 1883, 206.

寶節略》，但從本國受到「做了不是我們可以答應的一些讓步」的指責，是因為清朝將《節略》的規定與應該「撇開」的自己的「原則」結合在一起。從法國的立場來看，既然自國的「保護權」與清朝的「屬國」、「宗主權」概念相矛盾，被當作「勢不兩立」，那麼，只要不改變清朝的姿態，又將自己的「原則」「撇開」不談，最後，法國很可能就永遠地失去自己的「原則」了。如按照清朝的提議，接受《李寶節略》的內容，就涉及把北圻的「保護權」交付清朝，恐有否定法國自身「原則」的疑慮。茹費理於 1883 年 9 月 27 日，與曾紀澤會談時提到：

其實，清朝要求……把北京朝廷主張對越南全境保有的無效的宗主權改變為對越南的一半領土的真正的領有。⁶¹

這十分明顯地表達了法國對清朝的不信任。就這一點，《李寶節略》曾提到的「維持現狀」的方案，早已經不值一談了。脫利古在談判時，採取更強硬的態度，對自國的「原則」絕不讓步，這正是寶海的談判及其挫折必然導致的結果。

六、結語

對法國來說，軍事上干涉北圻，就是《甲戌條約》中規定的「保護」，是應有的措置方法。事實上，法國認為這是基於已經取得的「保護權」而

⁶¹ *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Entretien de M. Jules Ferry, chargé par intérim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vec le Marquis Tseng*, 224. 與此對應的漢文史料是《中法越南交涉檔》冊3，頁1391，主旨更清楚。如下：

中國雖為越南上邦，不過虛應故事，毫無實跡，既不理越南之事，亦不除紅江之賊，法既任其事矣，行其權矣。而今欲法自棄前功，而以中國上邦之虛文變為管轄越南之實跡，致使越南入於中國版圖，法國豈能允許。

有關那次會談，參見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頁211-212。

採取的行動，即使還沒有明文規定，法國的「原則」就是北圻的「保護權」。⁶²但是，清方主張「宗主權」，不但對此提出抗議，而且開始在北圻當地妨礙法國的行動，使得清法的對立和談判無法避免。寶海肩負打破僵局的使命，採取不提到「原則」，謀求在行動上達成清法的「和解」。這是他向總理衙門訴說彼此的「原則」相互矛盾，向李鴻章主張「撇開」不談的理由。

其中，具體提出的「和解」案是爲了保持北圻的安全，「維持現狀」而畫定南北的勢力範圍。寶海企圖將「撇開」不談的方針和這個具體方案結合在一起，與清朝達成協議。當然，在那個時候，他並不打算做出事關法國的「利害」與「原則」的「讓步」。《李寶節略》是以北圻勢力圈畫分案爲主軸，費盡心思擬定的，其法文版本的字面依照他的要求，不使用「保護」這一詞句。對以包含寶海在內的法國而言，那應該被解讀成清朝「承認」法國的「保護權」的用語。

不過，清方的看法並不一樣。清朝也不打算做出與自身的「利害」與

⁶² 這個論點即使可能在上文論述已經明白，無庸再議，也依據漢法兩文的史料舉出早期例子。1881年1月7日，曾紀澤在聖彼得堡與法國大使商犀 (Antoine Eugène Alfred Chanzy) 會談，說：「貴國係照約保護該國」(《中法越南交涉檔》冊1，曾紀澤與法駐俄公使商犀問答節略，光緒六年十二月初八日，頁151)。商犀在將這次會談通知本國時，把曾紀澤的發言譯成「法國根據1874年的條約對越南所加之保護權(le protectorat que vous exercez, en vertu du traité de 1874, sur l'Annam)」(*Livre Jaune, Affaires du Tonkin, Première partie, Chanzy à Barthélemy Saint-Hilaire, le 8 janvier, 1881, 169*)。邵循正雖然還不能看清方漢文版本，但是早已「疑法使所記『保護權』乃『保護』之誤」(《中法越南關係始末》，頁62註17)，慧眼令人佩服。這次當翻譯的是隨曾紀澤的慶常，所以他應該說逐字逐句忠實於漢文的法文，決不可能提到商犀寫的譯詞和措詞。商犀對此誤寫那樣，可以說是表現當時法國一般的想法。將《甲戌條約》所記載的「保護」跟「保護權」同樣看待的法方想法，自從當初已經明顯。從而值得注目的是，比如像 A. H. Foucault de Mondion, *La vérité sur le Tonkin* (2^e éd. Paris: A. Savine, 1889), 5 論述那樣，《甲戌條約》「不規定設定對越南行使的政治性保護權。那單是和平友好條約」。所以反過來說，法方必須締結明文規定「保護權」的《順化條約》。

「原則」相關的「讓步」。當時，不論是總理衙門或李鴻章，都拘泥於「保護」這一字樣，寫在《李寶節略》的漢文版本中。這是因為他們仍認為越南是清朝的「屬邦」。如果向西方主張「屬邦」，就需要證實擁有「屬邦」的「保護權」。適切於此的理論，不涉交渉的人物在寶海談判之後上奏，如下的一段文字清楚地表明出來：

中國所謂屬國，即外國所謂保護。……查，法越和約云「法國明知越國係操自主之權，非有遵服何國。儻有匪梗並外國侵擾，法國即當幫助」。是明謂越南非中國之屬國，而欲以自許幫助，假託保護，以自便其蠶食之謀。如日本滅琉球故智。然則中國欲爭越南，必先爭屬國之名，欲存屬國，必先存保護之實。⁶³

在此，即便是清朝，也堅持「屬國之名」與「保護之實」不可分開的理論，與法國的爭論點在於後者的理解，大概是肯定的了。《李寶節略》的書面上雖然不提及「原則」問題，正因為不提及「原則」問題，清法雙方暗中都想要與「原則」結合起來。因此，結果，清朝的理解和行動，都與寶海和法國期待者相去甚遠。

在「設置一種緩衝地帶」、「維持現狀」等眼前可見的行動上，達成一定程度「和解」的《李寶節略》，⁶⁴沒有提及其行動所根據、具有永久性效

⁶³ 《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4，〈內閣學士周德潤請用兵保護越南摺〉 光緒九年四月初七日，頁6。為了更清楚這些論點的定位，應當參見李鴻章的發言，如下：「論越為中華屬國，全境皆應歸中國保護，此乃泰西通例，然中國自古朝貢之邦，不攙與其內政，更無保護明文。」《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復倪豹岑中丞〉，光緒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頁36。

管見所及，至少在越南的方面，自1882年10月以前，清朝本國沒有提到這種「保護」的概念。最早提到的是，曾紀澤向商犀的主張，如下：「法國欲保護該國、固屬好意、然中國亦操保護之權。」（《中法越南交涉檔》冊1，曾紀澤與法駐俄公使商犀問答節略，光緒六年十二月初八日，頁150）但是清朝本國怎樣接受這個發言，還沒清楚。

⁶⁴ 坂野正高，《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頁353（陳鵬仁、劉崇稜譯，頁289）。

力的「原則」。爲此，很可能成爲「矛盾的組合(une combinaison contradictoire)」，或是加劇「原則」與「利害」對立的「禍根(une source d'embarras et de conflits inévitables)」。⁶⁵拒絕批准《李寶節略》與召回寶海，象徵法國對其事的明確理解，以及所採取的應對方針。如同脫利古所言，法國不久即決意排除曖昧不明的《李寶節略》，圖謀明確地解決「原則」問題。

反之，清方在擬定《李寶節略》的前後期間，堅持一貫的解釋和態度。寶海認爲應該「撇開」不談的「原則」問題，清方一開始即認爲應該與規定的行動結合起來。當法國察覺到這種情況，回到「原則」問題的時候，清方亦再次開始明確地主張自己的「原則」。與此同時，鑑於李、寶談判，清方在看清可以與法國達成協議的條件是「撇開」「原則」和「分享」北圻的「保護權」之後，能夠面對新的談判。

那與法方的解釋不同自不待言，就連清朝內部也懷疑能否付諸實現。⁶⁶因此，兩國的關係在 1883 年後半迅速惡化，清法兩國不得不動武，謀求新的妥協。

⁶⁵ *Journal officiel, Débats parlementaires, Chambre des députés*, 1686.

⁶⁶ 清朝現場當局和所謂「清議」都說：北圻的南北分割「保護」，難以付諸實施。比如參見唐景崧，《請纓日記》，光緒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收錄於中國史學會主編，《中法戰爭》（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5）冊2，頁61；《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3，〈廣西巡撫倪文蔚密陳遵籌法越交涉事宜摺〉、〈倪文蔚密陳越南國勢分界保護實無把握片〉，光緒九年正月十六日，頁29-30；張佩綸，《澗于集·書牘》，卷2，〈復張孝達中丞〉，頁24；張佩綸，《澗于集·奏議》，卷3，〈法諜謠傳不徵信片〉，光緒九年五月十七日，頁33。

參考書目

Bibliography

(一) 檔案、文集、報紙、公報、史料

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法越南交涉檔》，臺北：中央研究近代史研究所，1962。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bian. *Zhong Fa Yuenan jiao she dang*,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1962.
2.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法戰爭》，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5。
Zhongguo shi xue hui, zhu bian. *Zhong Fa zhan zheng*, Shanghai: Xin zhi shi chu ban she, 1955.
3. 李鴻章撰、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84。
Li, Hongzhang, zhuan; Wu Rulun, bian. *Li Wenzhong gong quan ji*, Taipei: Wen hai chu ban she, 1984.
4.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編，《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1932-1933。
Guo li Beiping gu gong bo wu yuan, bian. *Qing Guangxu chao Zhong Fa jiao she shi liao*, Beiping: Guo li Beiping gu gong bo wu yuan, bian, 1932-1933.
5. 張佩綸，《澗于集》，豐潤張氏澗于艸堂刊本，1918、1922。
Zhang, Peilun. *Jianyu ji*, Fengrun Zhang shi Jianyu cao tang kan ben, 1918, 1922.
6. 曾紀澤著、姜亞沙責任編輯，《曾惠敏公電稿》，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5。
Zeng, Jize, zhu; Jiang Yasha, ze ren bian ji. *Zeng Huimin gong dian gao*, Beijing: Quan guo tu shu guan wen xian suo wei fu zhi zhong xin, 2005.
7. 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中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Jiang, Tingfu, bian. *Jin dai Zhongguo wai jiao shi zi liao ji yao* Vol. 2, Shanghai: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34.
8. 薛福成撰，《庸盦文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Xue, Fucheng, zhuan. *Yongan wen bie ji*,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1985.
9. *Affaires du Tonkin, Deuxième partie, décembre 1882-1883*, Paris: Imprimerie

- nationale, 1883.
10. *Affaires du Tonkin, Première partie, 1874- décembre 1882*,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83.
 11.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1871-1914)*, 1^{re} Série(1871-1900), Tome 4,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32.
 12. Franc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法國外交部檔案),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Chine.
 13. France. Assemblée nationale (1871-1942). Chambre des députés.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ébats parlementaires, Chambre des députés*, Paris: Imprimerie des Journaux officiels, Session ordinaire de 1883, séance du mardi 10 juillet 1883.
 14. Franc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Livre Jaune* (法國黃皮書)。
 15.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January 10, 1883.
 16. *The Times*, London: October 29, 1883.

(二) 專著

1. 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
Li, Enhuan. *Zeng Jize de wai jiao*, Taipei, Zhongguo xue shu zhu zuo jiang zhu wei yuan hui, 1966.
2. 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Li, Huachuan. *Wan Qing yi ge wai jiao guan de wen hua li cheng*, Beijing: Beijing da xue chu ban she, 2004.
3. 邵循正，〈中法越南關係始末〉，北平：國立清華大學，1935。
Shao, Xunzheng. *Zhong Fa Yuenan guan xi shi mo*, Beiping, Guo li qing hua da xue, 1935.
4. 龍章，〈越南與中法戰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Long, Zhang. *Yuenan yu Zhong Fa zhan zheng*,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96.
5. Mondion, A. H. Foucault de. *La vérité sur le Tonkin*. 2^e éd, Paris: A. Savine, 1889.
6. Cordier, Henri.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 Tome 2, Paris: Félix Alcan, 1902.
7. Eastman, Lloyd E. *Throne and Mandarins: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Sino-French Controversy, 1880-188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7.
8. Semallé, Marie Joseph Claude Édouard Robert, comte de. *Quatre ans à Pékin, août 1880-août 1884. Le Tonkin*, Paris: Gabriel Enault, 1933.
 9. Un diplomate[Albert Billot], *L’Affaire du Tonkin: 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l’établissement de notre protectorat sur l’Annam et de notre conflit avec la Chine, 1882-1885*, Paris: J. Hetzel, [1885].
 10. 岡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近代清韓関係と東アジアの命運》，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
Okamoto, Takashi. *Zokkoku to jishu no aida: kindai Shin-Kan kankei to Higashi Ajia no meiun*, Nagoya: Nagoya Daigaku Shuppankai, 2004.
 11. 岡本隆司，《馬建忠の中国近代》，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
Okamoto, Takashi. *Ba Kenchū no Chūgoku kindai*, Kyōto: Kyōto Daigaku Gakujutsu Shuppankai, 2007.
 12. 坂野正高，《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ヴァスコ・ダ・ガマから五四運動ま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陳鵬仁、劉崇稜譯，《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
Banno, Masataka. *Kindai Chūgoku seiji gaikōshi: Vasuko da Gama (Vasco da Gama) kara Goshi Undō made*,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73. (Banye Zhenggao, zhu, Chen Pengren, Liu Chongling, yi. *Jin dai Zhongguo zheng zhi wai jiao shi*,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2005.)
 13. 坪井善明，《近代ヴェトナム政治社会史——阮朝嗣德帝統治下のヴェトナム一八四七—一八八三》，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
Tsuboi, Yoshiharu. *19-seiki Betonamu no seiji to jukyō : Shitokutei (1847-1883) no baai*,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91.

(三) 論文

1. 桑兵，〈陳季同述略〉，《近代史研究》，第4期(北京，1999)，頁113-141。
Sang, Bing. “Some Discusses on Chen Ji Tong,”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4 (Beijing, 1999), 113-141.
2. 和田博徳，〈阮朝中期の清朝との関係(一八四〇年—一八五〇年)——アヘン戦争から戦争まで〉，收入山本達郎編，《ベトナム中国関係史——曲氏の抬頭から清仏戦争まで》，東京：山川出版社，1975。
Wada, Hironori. “Genchō chūki no shinchō to no kankei (1840-1850): ahensensō kara shinfutsu sensō made,” in Yamamoto Tatsurō, bian. *Betonamu Chūgoku kankeishi: Kyoku-shi no taitō kara Shin-Futsu Sensō made*, Tōkyō: Yamakawa Shuppansha, 1975.

**Between vassalité and protectorat:
Sino-French Controversy on the Tonkin Affair, 1880-1883**

Okamoto, Takash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Kyoto Prefectural University

The results of the Treaty of Tientsin, signed in June of 1885, which put an end to the Sino-French War were the “loss” of the vassal state of Vietnam by China and a giant step toward achievement of its colonization by the French. Given this outcome, the changes that occurred during what is known as the “Tonkin Affair” might be termed a matter of course. Nevertheless, in regard to many of the facts that led to warfare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much remains unclear, such as what brought about their confrontation, how they reached a compromise, the special interests that concerned them, and the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m. This article explores clues to explain such questions by examining the course of the negotiations from the proposal of the Li-Bourée Convention concluded in late 1882 until its later abandonment.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over the Tonkin Affair became conspicuous when the Chinese Minister to France, the Marquis Tseng, protested to the 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t the end of 1880. In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French Minister to China, Frédéric-Albert Bourée, and the Tsungli-Yamen (總理衙門) at Peking in 1882, part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Tonkin were proposed, and, at the end of the same year, were put in writing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Bourée and the imperial commissioner for Northern Ports Li Hung-chang at Tientsin. However, the term *hsün-ch'a pao-hu*

(巡查保護), meaning to surveille and protect which appears 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Li-Bourée Convention, was recorded only as surveillance in the French, resulting in a discrepancy. This expresses the interests of the two parties and latent contradictions regarding them.

In opposition to the Chinese use of the term pao-hu “protect,” which furthered the advocacy of the vassalité of Vietnam to China , the French denied the suzeraineté of China by not referring to protection and thereby aimed to win recognition of Vietnam as a de facto protectorat of France. In this way, not only were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at odds, but this beca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so that the rejection of the Li-Bourée Convention was inevitable. There was no easy way that the confrontation might be ameliorated in the following negotiations between Arthur Tricou and Li, and France and China proceeded step by step toward rupture and warfare.

Keywords: *vassalité, protectora, Tonkin, Affair, suzeraineté, Li-Bourée Convention*